

女性主义的四副面孔

吴 菁

没有哪种理论比女性主义招致更多误解了，除了依然存在的父权文化对它的嘲弄攻讦之外，也因为自身包含了太多矛盾的观点与深层困境。女性主义是一个复杂的阵营，派别林立，但却有一面共同的旗帜，即努力消除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使女性获得充分自由和全面发展。但对于平等的内涵、平等的路径以及平等的目标等方面的理解却千差万别，有些甚至截然相反。起源于女权运动的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到当今，已转变为多样化的实践批判与文化批判，本文

重点梳理作为女性主义“三大家”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以及作为新女性主义代表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将这四种主要流派称为女性主义的四副面孔。在历史的梳理过程中反观女性主义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困境及其解决方案。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起源于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常常作为女性主义最古老的知识传统，致力于推

动女性在教育、就业、选举等方面的平等权利。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作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先河之作,其核心思想是倡导两性平等教育,抨击传统教育模式不鼓励女性发展理性能力的做法。她认为如果男性像女性一样被限制在狭窄的家庭领域,并以打扮和取悦于人来生活,也会演变出所谓的女性气质——感性和情绪化。如果对女性给予像卢梭的《爱弥儿》中与男性一样的自由教育模式和理性教育理念,则会发展出独立自主、具有理性和道德能力的人。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论妇女的屈从地位》和哈里雅特·泰勒的《妇女的选举权》继承了颂扬理性和平等教育的理念。与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所不同的是,他们将平等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机会看成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关键,认为女性因其生理性别而无望于选举,是现代立法中的一个讽刺性的例外。他们还看到了一个可能的情形,就是即便妇女获得充分教育和完全的公民权后,她们中的大多数还是会“选择”留在私人生活领域,这也是100年后贝蒂·弗里丹在其影响甚广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中所描述的女性的“无名的问题”。穆勒与泰勒对于女性政治权力和经济机会平等的主张,也必然伴随着他们对于女性婚姻与养育问题的思考,可以说事业和家庭的两难是迄今为止女性普遍面临的生命境遇。泰勒接受传统母职观念,认为母亲要比父亲承担更多的养育责任,但她同时又认为在社会领域的“谋生”应成为女性的首要责任,这是平等的基础。在此,泰勒的论述显示出一种游移,最后无奈“折中”出第三种选择,即女性既承担母职又要事业或工作。这也正构成了距泰勒论述百年后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女性解放实践所带来的“花木兰式困境”——“双肩挑,双肩都要硬”的重负(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更详细的探索)。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在20世纪最重要的发展是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它对于美国主流文化所建构的完美主妇神话进行了炮轰和分析。该书开篇以一种电影化的视觉形象和仿若内心独白的低语描述了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在幸福平稳生活表象下的空虚与压抑,这些女性已经拥

有良好的教育、选举权和工作的机会,但是她们为什么仍然把家庭主妇作为自己的选择同时又感受“无名的烦恼”?“这些妇女花太多时间去打扫她们实际已经很整洁了的房间,修饰她们已经很有吸引力的容貌,娇惯她们那些已经被惯坏了的孩子,这样的生活替代了更有意义的目标。”^①尽管弗里丹对这种传统的生活图景不满,但她也并没有要求女性为了事业牺牲婚姻和母亲身份,她认为“女性奥秘的错误不在于看重婚姻和母亲身份,而是过分重视这两种实践方式,把这看做是妇女全部人性需求和欲望的答案”^②。与早期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一样,弗里丹呼吁女性进入公共生活领域,却没有召唤男人进入私人家务领域。

如果说《女性的奥秘》对“主妇综合症”进行了剖析,那么弗里丹的另一著作《第二阶段》对“女强人综合症”进行了反思。她在尊重女性生命经验和价值感觉的基础上,看到了因传统的女性主义之名——女性试图成为全职事业型妇女与全职贤妻良母背后的筋疲力尽。她反问包括自己在内的女性主义者,女性是否能够和是否应该完成不止一个、而是两个完美标准。在这一问题上她远比前辈泰勒的闪烁其词来得坚定,在反思中重估了“女性气质”的价值,主张女性融入公共世界与男性融入私人世界的同步过程,这既是对女性的解放也是对男性的解放。在《第二阶段》中,弗里丹使得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即从最初的建议女性和男人一样才能平等,转向主张只有社会像重视“男性气质”一样重视“女性气质”,女性才能和男性平等。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作为“最古典”的女性主义流派,它有力地推动了女性在教育、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的获得,这一工作仍然在继续,但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仅仅理解为强调男女的同一性来实现男女平权的思想与实践,又显然忽视了这一流派的新发展,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自身也在反思,也开始重视性别差异,也在强调诸如基于特定社会性别的法律比起一般中立的法律更能保障两性平等之类的话题。但如何有区别地同时又是平等地对待女性和男性,仍然是一个危险而纠结的问题。

激进女性主义

激进女性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它不赞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关于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女性缺乏教育、政治、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与机会的观点。激进女性主义将矛头直指性/性别制度^③本身,认为性别等级制度是一切权力关系的范式,“个人的即政治的”(Personal is political)是这一流派最著名的口号。

首先,激进主义女性主义侧重于对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批判。凯特·米利特是最早将父权制^④这一概念引入女性主义理论的人。她在《性政治》中提出性是政治,性别关系与秩序构成了一切权力的范式。她列举了三位色情文学巨擘——D. H. 劳伦斯、亨利·米勒和诺曼·梅勒作品中的性描写段落,对其露骨的大男子主义和性暴力进行了炮轰,这些色情描写凸显了个人领域中的政治关系。

在对社会性别制度的反思上,“雌雄同体”的概念备受激进女性主义者关注。乔琳·J提出“荡妇(Bitch)之所以令人不安就在于她是雌雄同体的。她在自身内结合了被界定为‘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气质……她没有对所谓‘永恒的女性’其含蓄、微妙和神秘性的嗜好”^⑤。乔琳看到了父权制主流观念否定的女性形象身上的颠覆性力量,也表达了激进女性主义者最初的愿望,打破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边界与束缚,挑战性/社会性别制度。后来的激进女性主义者进行了更审慎的辨析,认为“荡妇”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相反,她可能是拥有最坏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人。尽管米利特也渴望雌雄同体的文化整合,但她同时认为应该谨慎地对男性气质特征和女性气质特征做出彻底评估。

也有不少激进女性主义者反对“雌雄同体”观念,认为应该肯定妇女最重要的女性特征,强调那些在文化上与妇女相联系的价值和美德,如情感、分享、无等级制、身体、自然、和平等,而不是要去强调那些文化上与男性相联系的价值,如理性、独立、意志、等级制、统治、战争等。因此,女性不应该像男人一样,而应该努力更像女人,保持其女

性气质特征,摆脱“男性添加剂”的毒害。

在关于“雌雄同体”的论争中,玛丽·戴利的思考较为深远。她在《超越父神》一书中去质问一个前提性的问题:“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概念本身有没有问题?女性气质本身就是父权制建构的概念模式,在这一基础上的雌雄同体就像一个实际上循环自我指涉的绕口令,所以戴利既拒绝那种“融合的”或“多元主义”的雌雄同体模式,即把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融合在一起,也不赞同那种“本质主义”的女性气质观。

其次,激进女性主义者还对生育与母职问题有很多思考。这一议题再次导致激进女性主义内部的分裂:激进自由派认为自然生育是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应该以人工生育方式替代自然生育方式,这样妇女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社会生产;而激进文化派认为妇女力量的终极源泉正是在她们孕育新生命的力量中,夺走这一力量,会让她们在男人的权力面前更加脆弱。生育技术远非解放妇女,反倒更可能巩固男人控制女人的权力。

在母职问题上,激进自由派女性主义者认为母职是一种文化建构,一个带有压迫目的的神话。它让人相信一个女人不做母亲就不是真正的女人或完整的女人,同时母职价值观把严苛的标准加诸女性,要求她们忘我奉献、全身心付出。费尔斯通质疑生育和养育孩子未必是“真正喜欢”孩子的结果,实质上是把孩子作为自我扩张的工具与补偿性的替代。激进文化派女性主义者虽然也认为父权社会把养育孩子的职责倾倒在妇女是问题所在,但解决之道并不是抛弃孩子。妇女不应该在“解放”的名义下放弃女性生物性规律,更好的解决之道是驾驭而不是对抗自己的身体,按照自己最满意的方式来运用自己的身体,按照女性主义的价值来养育孩子,这对于女性来说更具建设性。^⑥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尽管区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可能的,但从根本上而言它们却可以看成是一个群体。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常被看成是后

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的一种结合。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受压迫的终极原因是阶级歧视,而不是性别歧视。女性所受的压迫远不如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那里承受的苦难严重,妇女解放最终有赖于无产阶级革命。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对这种论述颇为不满,力图阐明资本主义如何与父权制交互作用,对女性施加了比对男性更异乎寻常的压迫。因此女性必须在两个战场反抗资本主义父权制这一双头兽。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最集中的议题是和劳动相关的妇女问题。让女性主义者颇感不满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劳动的理解是双重标准的。马克思的劳动实际上指的是社会劳动,认为社会劳动是生产性的,家务劳动是非生产性的。玛格丽特·本斯顿在《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一文中提出,在任何经济劳动分析中必须认真对待家务劳动,不能把它视作边缘的,甚至是不存在的状况。只是在一个金钱决定价值的社会里,“男人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抑制了女人以使用为目的的生产,这种情况为男性权力奠定了重要基础”^⑦。玛利亚罗莎·达拉·斯科特进一步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这个生产性不仅体现为人们口头上所说的“有用”,而且也体现为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创造剩余价值”。^⑧妇女的工作是所有其他劳动的必要条件,剩余价值就是从这里榨取出来的。由此,部分女性主义者发起家务计酬运动,但这一方案在现实生活中既缺乏操作性,又不受欢迎。如果由成年男性支付给家中女性成员工资,就会导致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商品化;又有女性主义者提出由国家向已婚男人征收特别税,然后由财政部再分配给他们的妻子。抛开这些具体的操作方案不谈,“家务计酬”本身犹如一把双刃剑让女性主义者不安:家务得到报酬,妇女更加失去到家庭之外工作的动力,等于变相鼓励妇女做家庭主妇,传统的性别分工实际上被强化。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对于家务劳动的全面反思使得她们的女性解放纲领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有所差异,她们认为应把家务劳动社会化

置于首位,而不是首推妇女全体进入社会劳动领域,否则会带来“双重压迫”。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妇女解放规划中也提到家务劳动社会化,但是他们对于性别分工并没有自觉的审视,对于家务劳动这些传统“妻职”、“母职”并没有异议。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在首推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同时还表达了一种深层焦虑:结果可能是妇女在社会中承担的工作大多是她们在家中工作的变种。的确从当今的劳动市场上看,社会把更多边缘性、辅助性的工作留给女性,习惯性地认为是适合“女性气质”的工作。还有一个连带的深层隐忧是,普遍而言女性的职业空间与薪水低于男性,每当发生社会性的经济危机或个人家庭的应急需要时,从公众领域退回到私人领域的大多是女性。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不满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强调阶级主控甚于性别主控,质问后者的“女性主义”究竟指的是什么,追问为何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性别压迫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吸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思维的同时,认为当今女性受压迫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结果,也是父权制性别体制的产物,社会与心理的差异也是重要因素。相比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更具有交叉性,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是阶级、性别、种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多元化、全球性的理论。

后现代女性主义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出现显示了一种重大转向,它使得女性主义对于父权制社会的批判重心从政治的、经济的层面转向文化层面,而且直指文化上层结构中最深层、最精微之处,企图对一直主宰着人类意识结构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从根本上加以颠覆。

后现代女性主义重视对语言的批判。露丝·依丽格瑞在《痴呆症的语言》中,尖锐讽刺女性语言与痴呆症语言之间的同构性。痴呆症的语言特点是“被谈论多于谈论,被表述多于表述,因此痴呆症患者不再是一个发言的真正的主体……他只

是从前所发出言语的一个可能的发声筒而已”^⑨。痴呆症相对于语言结构的被动模拟,正是女性相对于菲勒斯中心话语的关系的复现。深陷男性中心的语言/象征体系中,女人要么缄默,要么鹦鹉学舌模仿男人说话。

埃莱娜·西苏进一步批判语言的深层结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如太阳/月亮,文化/自然,父亲/母亲,理智的/感性的……所有这些二元对立都包含了潜在的优劣秩序,而男/女的二元对立是所有这些阶序式二元对立的原型。在男/女的二元对立中,男人是自我,女人的存在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当男人的他者,二是不存在。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主体是在语言中被建构的,正是这样的二元对立模式深深嵌入文化的各个层面,悄然结构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它已经成为一种“暴力”。

西苏认为书写是女人可以抵抗象征秩序的一个充满颠覆与救赎意义的场域。在《美杜莎的笑》中她提出了“阴性书写”宣言,要发展一种抵抗二元对立的书写方式,释放那一切二元对立中被压抑一元的原型即阴性。不同于“阳性书写”所依赖的征服与掌控,“阴性书写”可以“接受‘混沌’,尊崇、颂扬差异”^⑩。西苏眼中的阴性,可以包含非理性、无秩序等,但后者又不能完全等同和涵盖阴性。

依丽格瑞则提出“女人话”的概念及其实践策略。“女人话”只能是一种微观政治,在父权象征语言的裂隙中,以戏拟、模仿的姿态展现,“她不能假装是在某种外在于父权制的纯粹女性主义领域中写作:如果她要别人不把她当话当做是无法理解的絮絮叨叨的话,她必须模拟男性话语。而女性气质只能在她自己模仿的符号和字里行间留下的空隙中寻求了”^⑪。夸张是依丽格瑞重视的形式,即妇女采纳男人制造的女人形象,以放大数倍的比例折射这些形象给男人看。^⑫当然这一主张颇受怀疑,模仿父权制建构的女性以便颠覆它,可能正好掉入其陷阱受其支配,其中的界限不甚分明。

身体是后现代女性主义重视的场域。依丽格瑞在“女人话”与女性力比多之间、西苏在阳性写

作与男性性欲、阴性写作与女性性欲之间建立了密切连接。“男人用他们的‘袖珍能指’——阴茎/阳具/笔这三位一体不断重复同样的老套”^⑬;而女性性欲无限变换、流动不居,女性的声音也具有颠覆阳物式单一快感与同一性逻辑的潜能。她们试图从女性力比多、女性的欲望与想象中寻求阴性书写的动力与源泉。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论述具有诗性气质,值得指出的是,依丽格瑞和西苏并没有简单地在“女性——女人话/阴性书写——非同一逻辑”之间画上等号。尽管西苏认为女性性欲的多样性使得女性更接近阴性书写,但她并不认为作者性别与作品是否阴性风格之间存在着简单对应关系。她认为理论上不论男女都潜在地具有回溯到前俄狄浦斯时期原初母性空间的能力,创作出阴性文本。如果男性创作出“阴性书写”,更具革命的颠覆性,因为那样更易引起父权文化的不安。

另一位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不赞成把语言与生理结构混为一谈,认为把书写分为阳性与阴性,无异于把男性与女性再一次放入菲勒斯中心二元对立模式中。

克里斯蒂娃对女性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基础是其符号分析学。在前俄狄浦斯时期的“符号态”,孩童与母亲是一个尚未分割的“关联体”,主导孩童心理驱力的口腔及肛门冲动,在“母性空间”(chora)^⑭中流动翻腾。它是不可名状的、流动着的各种律动,不能用语言体系的概念来说明。在孩童获得语言、建构自我的初始阶段,原来浑然一体、物我不分的母性空间被割裂,以使语言符号获得位置的差异,从而达成意指的功能。在孩童进入象征秩序后,“母性空间”的符号态即被压抑,但仍旧存在,构成了语言的无意识面向,并对象征语言与秩序具有颠覆的潜能。

克里斯蒂娃并不认为边缘性是可悲叹的处境,她重视边缘性带来的自由、差异与颠覆性。女性与符号态之间虽然没有“本质的关系”,但是却分享了同样的“边缘性”以及与之相随的“颠覆性”。菲勒斯中心主义将女性边缘化,女性具有边境地带所有令人不安的属性:混沌神秘,她们“非内非外”,“非已知也非未知”。父权文化时而

把女性妖魔化,时而圣洁化。女性作为外在还是内在,依据父权社会彼时象征秩序的需要。

克里斯蒂娃在论述中自觉地抵触本质主义的倾向。她认为“女人特质”不是天生的本质,而是一连串选择的结果,“妇女就其本身而论并不存在”。克里斯蒂娃认为哲学意义上的女性是不存在的,但是作为政治意义上的女性还是有必要的,在这点上,她试图把对女性的定义从“本质的”变为“关系的”、“策略的”。

女性主义思想的多样性既是对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的深入批判,也意味着它屡屡面临各种“精神绝境”,而其中无法避免的语言问题/父权象征秩序的绵密渗透、政治与理论的双重诉求更是女性主义理论自诞生起就悄然裹挟的深层困境。如同朱迪丝·巴特勒不无无奈地说,没有别的办法,对于女性主义最好的莫过于说没有女性。女性作为一种身份政治的确容易陷入本质主义的泥沼,因此历史上诸多女性主义的观点如对感性价值的重估、对女性性格的分析等都反而是再次激活了父权思维,而且对于父权制的权力结构本身并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但是,“没有女性”这种说法又是危险的,它使得女性主义从内部分裂和自我颠覆。女性主义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女性解放实践,现实世界中的女性仍然需要“女性”这个同一性逻辑下的概念去维护各种权益。这种先天性的“首鼠两端”倒也激发了女性主义从来不敢步自封、铁板一片,不追求理论的体系与完整。它甚至认为理论本身在本质上是男权思想的产物,它伪装成中立、客观,事实上却为男权服务。面对各种现实的与思想的险境,女性主义不断变换自己的脚步,以一连串的辩论和挑战的形式出现。也正是“在逃脱处落网,在落网处逃脱”的际遇使得女性主义理论具有了别样的活力与魅力。

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4、69、157、294页。

- ③激进女性主义者盖尔·鲁宾(Gayle Rubin)认为性/社会性别制度是“一套安排,社会通过这套安排把生物学意义上的性转变为人类活动的产物”,父权制社会常常以生理学上的某些事实(染色体、人体结构、荷尔蒙等)为基础,建构出一套“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身份与行为,力图使所有人相信它的文化建构不言而喻是“自然”的。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Rayna R. Reiter,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p. 159.
- ④李银河认为米利特是最早将父权制(男权制)这一概念引入女性主义理论的人,指的是父亲做家长的机制,米利特为它加入了新的含义:第一,指男性统治女性;第二,指男性长辈统治晚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一概念被定义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参见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 ⑥罗斯玛丽·童在其著作的序言中就很自豪地叙述她用女性主义观念教育两个儿子,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是女性主义者。参见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 ⑦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
- ⑨转引自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 ⑩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 ⑪Toril Moi,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Methuen 1985, p. 140.
- ⑫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麦当娜被认为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以夸张女性性征的方式将自己建构为男性目光下的欲望客体,这种夸张和过度反而暴露了男权文化的可笑与荒谬。
- ⑬柏拉图形容“母性空间”是一种不可名状、无形式的存在,它涵容一切,而且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参与理智界。Toril Moi: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Methuen, 1985, p. 160.

作者简介:吴菁,1976年生,文学博士,同济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赵涛)

①②⑤⑧⑬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